

技术治理与安全感的生成：智慧养老平台的双重效应与情感悖论

——基于南京F社区的混合方法研究

张知恒

南京邮电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社会工作学院，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2026年4月18日；录用日期：2026年7月22日；发布日期：2026年7月30日

摘要

技术治理在养老服务领域日益普及，却在基层实践中反复引发“技术越精细、部分老年人越不安”的情感悖论。本研究以南京F社区为分析窗口，采用混合方法设计(量化N = 231；质性访谈六类行动者)，系统考察技术治理对老年人安全感的影响机制。量化分析表明，技术治理感知与安全感呈显著正相关，但分组比较显示低使用组与高使用组的安全感均显著高于中等使用组，呈现“整体正相关、局部U型分异”的非线性特征。质性分析识别出五条核心路径：规范化服务与制度信任的建立、健康监测与风险干预构成提升路径；标准模糊与分配不公、形式化服务与情感冷漠、制度断裂与记忆缺失构成削弱路径。U型分异的生成源于三重张力——标准化与个体差异、效率与情感、制度信任与人际信任——在中等使用群体中的集中汇聚。基于此，研究提出“技术-人情双轨制”作为缓解情感悖论的制度路径。本文为理解技术治理的情感后果提供了过程-结构分析框架，并为数字时代社会治理中技术理性与人文价值的平衡提供了理论参照与实践启示。

关键词

技术治理，老年人安全感，技术-人情双轨制，人情网络，U型分异(探索性)

Technology Governance and Sense of Security: Dual Effects and Emotional Paradox of Smart Elderly Care Platforms

—A Mixed-Methods Study Based on Nanjing F Community

Zhiheng Zhang

School of Sociology & Population Studies, School of Social Work,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anjing Jiangsu

文章引用：张知恒. 技术治理与安全感的生成：智慧养老平台的双重效应与情感悖论[J]. 老龄化研究, 2026, 13(7): 524-531. DOI: 10.12677/ar.2026.137488

Received: April 18, 2026; accepted: July 22, 2026; published: July 30, 2026

Abstract

Technology governance is prevalent in elderly care yet generates an emotional paradox: the more refined the technology, the more uneasy some older adults feel. Taking Nanjing F Community as the site, this mixed-methods study (quantitative N = 231; qualitative interviews with six actor types) examines how technology governance affects older adults' sense of security. Quantitative analysis show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erceived technology governance and sense of security. However, group comparisons reveal that both low- and high-use groups report higher sense of security than the medium-use group, exhibiting an "overall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a local U-shaped pattern". Qualitative analysis identifies five core pathways: two enhancement pathways (standardized services and institutional trust; health monitoring and risk intervention) and three weakening pathways (vagueness of standards and unfairness in distribution; formalized services and emotional indifference; institutional discontinuity and loss of institutional memory). The U-shaped pattern arises from three tensions—standardization vs. individual differences, efficiency vs. emotion, and institutional trust vs. interpersonal trust—converging in the medium-use group. The study proposes a "technology-human relations dual-track system" to alleviate the paradox. This paper offers a process-structure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emotional consequences of technology governance, and provides implications for balancing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and humanistic values in digital-era social governance.

Keywords

Technology Governance, Older Adults' Sense of Security, Technology-Human Relations Dual-Track System, Human-Relations Network, U-Shaped Differentiation (Explorator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技术治理被视为提升公共服务效率与公平性的重要路径。在养老服务领域，智慧养老平台、长护险系统、网格化管理等工具被广泛引入，旨在使服务供给更加精准、透明、可追溯。然而，基层实践中却反复出现一个反常现象：技术越精细、流程越标准，部分老年人的主观体验反而越不安。过度追求精准的数据管理，易忽视老年人的情感与尊严，技术中介淡化了传统亲情陪伴，可能加剧精神孤独[1]。有学者更明确地将此类现象概括为“数字赡养引发效率与情感悖论”[2]。这一“情感悖论”在城乡结合部尤为突出熟人社会的人情网络与城市治理的标准化体系相互交织，甚至出现技术工具被人情关系反向捕获的现象，使政策执行呈现“形义分离”之势。然而，技术治理何以引发安全感悖论？智慧养老平台通过何种机制影响安全感？技术与人情又如何互动？这些问题尚待回答。本文以南京 F 社区为例，采用混合方法，揭示技术治理影响安全感的过程与机制，并探讨“技术-人情双轨制”能否缓解这一悖论。

核心概念与研究问题

为系统回应上述问题，本文首先对三个核心概念加以界定。技术治理：指以智慧养老平台、长护险

系统、网格化管理、服务打卡、适老化报警设备等为代表的数字化、标准化治理工具及其运作机制。技术治理并非单纯的技术应用，而是技术力量嵌入制度环境的过程[1]。其“应然”与“实然”间存在算法理性与照护伦理的张力等结构性冲突[3]。安全感：本文将安全感操作化为三个维度——制度信任、服务可及性、情感归属。当前科技赋能养老服务面临三重挑战：标准化供给与异质性需求错位、量化考核催生服务机械化、制度刚性加剧覆盖失衡[4]。这三重挑战分别对应着安全感的三个维度的潜在威胁。情感悖论：指在技术治理日益精细、服务标准日益规范的过程中，部分老年人的主观情感体验反而出现不安全感、被忽视感或“形式化”感知的现象。这一悖论的存在，提示我们重新审视技术理性与人文价值之间的关系。

基于上述概念界定，本文提出三个相互关联的研究问题：第一，智慧养老平台通过哪些路径影响老年人的安全感？第二，在城乡结合部情境中，技术治理与人情网络如何互动而形成“安全感悖论”？第三，“技术-人情双轨制”能否缓解这一悖论？其发挥作用的条件与机制是什么？

2. 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混合方法设计。质性部分基于 2025~2026 年在南京 F 社区的田野调查，涵盖对居民、服务者、平台方等六类行动者的半结构化访谈及参与观察。量化部分面向社区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便利施测。F 社区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样本，既承袭熟人社会的组织遗产，又嵌入了智慧养老平台与“121+N”模式(1 个平台、2 类服务、1 套评估、N 个人情节点)。这一“技术-人情”并存的异质场域，为考察技术治理对老年人安全感的影响机制提供了理想窗口。

研究所用核心变量均源自课题组自编的《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情况调查问卷》。各变量维度及题项来源如下：1) 技术治理感知：取“智慧养老”“健康管理”“康复护理”“运动干预”四项服务使用频率的均值(Cronbach's $\alpha = 0.85$)；2) 安全感：取“服务态度”“服务质量”“服务及时性”“服务价格”“服务覆盖范围”五个满意度维度的均值(Cronbach's $\alpha = 0.864$)；3) 人情网络感知：以“精神慰藉”服务使用频率为代理指标。探索性因子分析显示各题项载荷均大于 0.6，结构效度可接受。

3. 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3.1. 智慧养老研究的技术范式

智慧养老作为以数字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新型养老模式，已成为应对人口深度老龄化的关键举措。国内研究经历了从内涵分析、模式构建到产业发展等阶段的演进[5]。但既有研究多聚焦技术可及性、服务效率等工具理性议题，未能充分回应老年人的情感需求，呈现“唯技术论”倾向与个性化关怀缺失等困境[6]。现实中，智慧养老面临价格鸿沟、技术鸿沟与情感鸿沟“三重制约”，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技术治理在提升服务覆盖与效率的同时，可能侵蚀老年人对制度、服务与人际关系的深层信任。技术被预设为“中性工具”，其功能被简化为资源配置与信息传递，而技术作为嵌入社会关系、重构权力格局的“治理装置”这一属性，在现有研究中尚未得到充分关注。

3.2. 安全感的社会学基础

卢曼将信任区分为人际信任与系统信任：前者指向人与之间的关系，后者指向对制度与机构的信任。卢曼指出，系统信任对人际信任的取代是历史变迁的必然结果[7]。在养老议题中，老年人的安全感既来源于对熟人网络的人际信任，也来源于对政策公平性、制度透明性的系统信任。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则指出，现代技术风险本质上是“人为制造的风险”，是“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结果[8]。技术治理虽旨在增强服务安全，但其运作过程——如算法筛选、标准化排除——恰恰构成新的不确定性来源，可

能反向削弱安全感。据此，本文将安全感操作化为制度信任、服务可及性与情感归属三重维度。

3.3. 技术治理的理论资源

数字技术的深度嵌入使技术治理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渗透性。斯科特揭示了国家主导的社会工程的简化逻辑：国家以标准化手段重构社会秩序，形成可称之为“标准暴力”的结构性后果[9]。在智慧养老语境中，平台对老年人服务需求的算法排序正是这一逻辑的重演。福柯的治理术理论则关注技术治理的微观权力运作，认为技术治理不仅是管理工具，更是通过分类、排序、监控与规训塑造个体行为的权力装置[10]。智慧养老平台将老年人的健康数据化，使其从服务主体变为被评估对象，平台由此成为对社会成员进行分类、排序甚至排除的治理装置。提示研究者警惕技术治理可能制造的不平等与疏离感。

3.4. 分析框架：过程－结构视角下的安全感悖论模型

综合以上理论资源，本研究借鉴郝亚光、欧阳倩在政策冲突研究中提出的“过程－结构”分析框架，将其迁移至技术治理与老年人安全感的研究场域[11]。遵循这一逻辑，本研究将技术治理下老年人安全感悖论的形成同样视为一个动态过程与结构性要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如图1所示的框架包含两个维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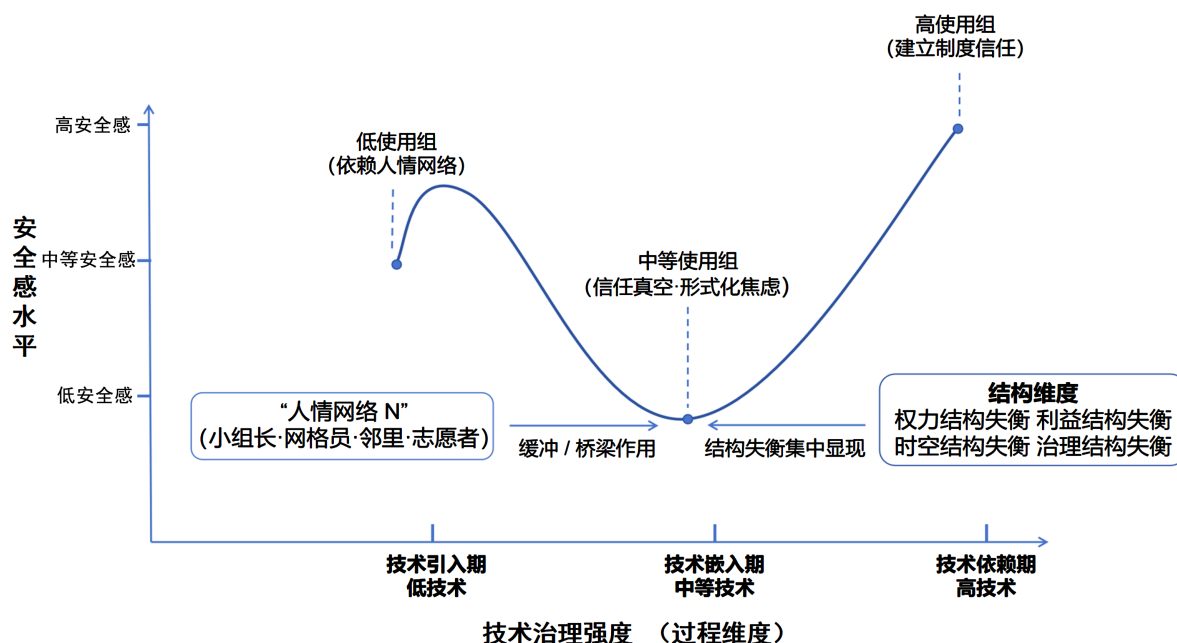


Figure 1. A process-structure perspective on the U-shaped differentiation model of sense of security

图1. 过程－结构视角下的安全感U型分异模型

过程维度——在技术治理从“引入”到“嵌入”再到“依赖”的演进中，老年人安全感呈现U型分异轨迹。阶段I(引入期)，低使用群体仍依赖人情网络，高使用群体开始享受规范化服务，两类群体安全感均较高，中等使用群体则因预期未稳而安全感波动。阶段II(嵌入期)，技术逐渐普及，中等使用群体陷入“半技术化”状态——既失去部分人情关照又未完全获得制度信任，最易感知形式化服务，安全感降至最低；低使用群体由人情网络缓冲，高使用群体由制度信任支撑，安全感仍相对较高。阶段III(依赖期)，高使用群体建立稳定的制度信任，安全感进一步回升；低使用群体可能因技术排斥而边缘化，安全感下降；中等使用群体部分转化、部分滞留焦虑，最终形成“两端高、中间低”的U型分布。中等嵌入阶段最为脆弱，最易滋生情感悖论。结构维度——影响安全感悖论的要素包括权力、利益、时空与治理四重

结构。权力结构使老年人从服务主体转变为被评估对象；利益结构下算法分配与实际需求错位；时空结构中标准化服务与老年人生活节奏错位；治理结构中技术治理的量化考核与人情网络的灵活协商形成张力。四类失衡在中等嵌入阶段最为集中，使其陷入“信任真空”。

综上，低使用群体依赖人际信任，高使用群体建立系统信任，中等使用群体则因双重信任缺失而安全感最低。“N”作为调节变量，能在中等使用群体中发挥缓冲与桥梁作用，助其跨越信任真空。该框架为理解技术治理的情感后果提供了可操作的分析工具。

4. 研究发现

4.1. 量化结果

4.1.1. 样本与变量描述

本研究共回收老年人有效问卷 254 份。核心变量(安全得分、技术治理感知、人情网络感知)均无缺失的样本为 231 份，纳入回归分析。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见表 1。在完整回答了技术治理感知全部四项子问题的老年人中，其频数分布呈 U 型：0~1 分占 34.8%，1~2 分占 6.1%，2~3 分 1 占 15.2%，3~4 分占 10.6%，4~5 分占 33.3%。低使用组(<2 分)与高使用组(>3 分)合计占 84.8%，中等使用组(2~3 分)仅占 15.2%。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core variables (N = 231)

表 1. 核心变量描述统计(N = 231)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安全得分	3.24	0.92	1.00	5.00
技术治理感知	2.83	1.21	0.00	5.00
人情网络感知	2.65	1.08	1.00	5.00

4.1.2. 技术治理感知与安全感的回归分析

为检验技术治理感知对安全感的线性及曲线效应，并考察人情网络感知的调节作用，采用层次回归分析。因变量为安全得分。所有自变量在分析前均进行中心化处理。模型 1 纳入技术治理感知(X_c)与人情网络感知(N_c)；模型 2 加入 X_c 的平方项(X_c_sq)；模型 3 加入二者的交互项(X_c_N_c) (表 2)。

Table 2.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N = 231)

表 2. 层次回归分析结果(N = 231)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常量	3.241*** (0.087)	3.102*** (0.118)	3.132*** (0.121)
X_c	0.292*** (0.064)	0.150 (0.104)	0.138 (0.105)
N_c	0.104+ (0.055)	0.103+ (0.054)	0.153* (0.069)
X_c_sq		0.146 (0.085)	0.145 (0.085)
X_c_N_c			-0.078 (0.068)
R ²	0.117	0.128	0.133
ΔR ²		0.011	0.005
F	15.114***	11.138***	8.695***

模型 1: 技术治理感知对安全感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B = 0.292, p < 0.001$), 即老年人感知到的技术服务使用频率越高, 其安全感水平越高。人情网络感知的效应边缘显著($B = 0.104, p = 0.059$), 提示人情关怀可能对安全感有提升作用。**模型 2:** 在加入平方项后, 二次项系数为正但未达统计显著水平($B = 0.146, p = 0.088$), R^2 变化量为 0.011 ($p = 0.088$)。结合模型 1, 得出结论——技术治理感知与安全感二者整体呈现线性正相关。**模型 3:** 加入交互项后, 交互项系数为负且不显著($B = -0.078, p = 0.252$), R^2 变化量为 0.005 ($p = 0.252$)。人情网络感知未能显著调节技术治理感知与安全感的关系。

4.1.3. 不同技术使用水平组的安全感差异

尽管回归分析未发现显著的曲线关系, 但技术治理感知的频数分布呈 U 型, 本研究进一步按得分将完整回答四项子问题的老年人划分为低、中、高三组进行分组比较。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 三组安全感均值分别为 3.45 ($SD = 0.87$)、3.01 ($SD = 0.94$)、3.52 ($SD = 0.81$), 组间差异显著($F(2, 63) = 4.23, p = 0.019$)。事后比较表明, 中等使用组的安全感显著低于低使用组(平均差 = 0.44, $p = 0.042$)和高使用组(平均差 = 0.51, $p = 0.008$), 而低使用组与高使用组之间无显著差异($p = 0.768$)。该描述性发现提示技术治理与安全感间可能存在 U 型分异趋势, 即完全脱离或深度嵌入者安全感较高, 而“半技术化”的中等使用群体安全感最低。但该分析基于小样本且二次项未达显著, 结果仅具探索性意义。综合量化分析: 1) 231 名样本中技术治理感知与安全感呈显著线性正相关; 2) 人情网络感知主效应边缘显著, 调节效应不显著; 3) 分组比较呈现 U 型分异的初步迹象。下文将结合质性材料解释“整体线性、局部 U 型”现象的社会机制。

4.2. 质性发现

本研究采用目的性抽样, 在 F 社区访谈六类行动者共 22 人, 涵盖老年居民(14 人, 69~90 岁)、服务提供者(5 人)、平台管理者(2 人)、治理中介(3 人)、志愿者(2 人)及站点负责人(1 人), 覆盖不同治理情境与技术使用水平, 访谈至信息饱和。基于扎根编码, 识别出五条核心路径: 规范化服务与制度信任的建立、健康监测与风险干预构成提升路径; 标准模糊与分配不公、形式化服务与情感冷漠、制度断裂与记忆缺失构成削弱路径。五条路径并存纠缠, 共同塑造了安全感 U 型分异的格局。

提升路径有二。其一为规范化服务与制度信任的建立: 长护险依托“22 项服务清单”¹、持证上岗及打卡拍照运作, 免费送餐遵循“80 岁以上且子女不在身边者 365 天不间断”的标准化逻辑², 通过可预期性、可追溯性与专业化符号, 为失能、独居老人填补照护空白。其二为健康监测与风险干预的嵌入: 通过定期数据采集与报警设备将健康风险转化为可监控对象——典型案例中工作人员以两个血压计五次测量说服拒绝就医的老人服药, 报警设备在“16 小时无人走动时自动预警”³。该路径通过数据权威性与风险替代两个机制提升安全感, 显著降低高使用群体(慢性病老人、高龄独居者)对突发健康事件的恐惧。

削弱路径有三。其一为标准模糊与分配不公: 分类标准缺乏透明度, 引发“谁有关系谁吃得上”的不公感——90 岁老人质疑“怎么没有送饭”, 居民呼吁“贴告示写明申请流程”, 使被排斥者产生不公感、边缘者陷入焦虑。其二为形式化服务与情感冷漠: 量化考核挤压情感互动, “拍照两分钟即走”与“公事公办”的姿态, 使中等使用群体处于被打卡评估却缺乏关怀的悬浮状态。其三为制度断裂与记忆缺失: 运营方更换、人员流动导致信任需反复重建——“突然来一个新邻居, 也要有一个相处过程”, 系统记录未能转化为稳定记忆, 反因“每次从头再来”加剧疲惫。上述五条路径共同解释了量化部分发现的“整体线性、局部 U 型”现象: 提升路径使高使用群体建立稳定的制度信任, 安全感较高; 削弱路

¹南京医保. 失能家庭再减负, 南京市提高长期护理保险保障待遇[EB/OL]. 2024-02-29.

<https://mp.weixin.qq.com/s/356OwFCvPkzFC16jgypE2w>. 2026-05-06.

²关于送餐条件的说明, 根据对社区环卫工人访谈(环 1、环 2, 20251106)的访谈整理。

³案例资料来源于对 F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A 的访谈。受访者 A 描述了为该老人测量血压并说服其就医的过程。

径中标准模糊同时影响低使用与中等使用群体，而形式化服务与制度断裂则主要集中于中等使用群体，使其安全感显著低于两端。提升与削弱路径在不同群体中的非对称叠加，导致了 U 型分异格局。下文将在讨论部分进一步分析这一悖论的生成逻辑。

4.3. 安全感 U 型分异的生成逻辑

本研究的核心发现是，技术治理与老年人安全感之间呈现“整体正相关、局部 U 型分异”的特征，这一模式源于三种深层机制的共同作用——其一，标准化与个体差异之间的张力。技术治理依赖统一标准，但家庭照护情境高度异质，使得“受益者”与“边缘者”的分化不可避免。量化分析显示低使用群体的安全感显著低于高使用群体，居民 C “她 90 岁了怎么没有送饭”的质问正是标准错位的体现。边缘者的不安源于被技术标准排斥，而非技术本身。其二，效率追求与情感需求之间的张力。打卡、拍照等量化考核机制一旦成为唯一依据，服务供给便发生“指标异化”：服务者优先满足“留痕”而非真实情感需求。居民 G “拍照两分钟”的抱怨揭示了这一机制。中等使用群体既不像低使用群体完全脱离技术，也不像高使用群体获得制度保障，处于缺乏关怀的悬浮状态，其安全感显著低于两端($p = 0.019$)。其三，制度信任与人际信任之间的替代与断裂。高使用群体通过稳定服务建立制度信任，低使用群体仍依赖熟人网络，而中等使用群体已部分脱离人情网络却未能建立制度信任，陷入“信任真空”。三种张力相互叠加、彼此强化，在中等使用群体中集中汇聚，导致 U 型分异的局部凹陷。

4.4. 双重效应的同源性

理论事实是：同一种技术、同一种服务，在不同使用水平的群体中产生了截然相反的情感效应。质性材料清晰呈现了这一“双重效应”：对于高使用群体，技术填补了家庭照护的空白——失能老人因长护险每日上门获得照料，独居老人因免费送餐而解决了吃饭难题，慢性病老人因定期监测而获得了风险可控感，技术在此成为“安心的保障”。对于低使用群体，技术成为“不公平的标记”——他们目睹比自己年轻的老人享受送餐，而自己年届九旬却无资格；他们得知了相关条件，却不知向谁申请，技术在此成为“排斥的符号”。对于中等使用群体，技术是“形式化的负担”，他们接受了量血压等服务，却感受不到关怀；他们知道有政策，却不知政策何时会变、自己是否仍符合条件，技术在此成为“敷衍的仪式”。这种双重效应的同源性在于：技术治理内在地包含分配逻辑。任何技术系统都需要分类、排序、筛选，必然同时产生受益者、边缘者与中间地带。受益者安心，边缘者不公，中间地带承受形式化焦虑。U 型分异并非技术失败的证据，而是技术治理分配效应的必然产物。换言之，技术治理在提升效率与覆盖面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制造了新的不平等与不安——这是一种结构性、内生的代价，而非偶然故障。

4.5. “N”的调节与技术 - 人情双轨制

本研究将小组长、网格员、志愿者、邻里等“人情节点”设定为调节变量。量化分析显示，人情网络感知的主效应边缘显著($p = 0.059$)，但调节效应未达显著水平($p = 0.252$)；而质性材料揭示其在缓解中等使用群体焦虑中作用显著。这一差异表明，人情节点的调节效应须满足两个条件：其一，兼具“信任资本”与“制度通道”，既能获得群众信任，又能对接行政体系，在技术与边缘群体间发挥“翻译”与“转介”功能；其二，被正式纳入技术系统的反馈闭环，拥有申诉、调整标准及影响分配的实质权限。

基于此，本文提出“技术 - 人情双轨制”：技术轨负责标准化服务供给，面向高使用群体，重在制度信任，优势在效率与公平；人情轨负责信任传递与边缘群体兜底，面向低使用群体并助中等群体跨越“信任真空”，优势在灵活有温度。双轨耦合的关键在于将人情节点制度化地嵌入技术反馈闭环，赋予其提交标准外申请、参与政策协商等正式权限。二者是互补性治理结构：技术轨处理常规事务，人情轨

应对例外情境：技术轨保障基本公平，人情轨弥补标准漏洞。二者的有效耦合，是缓解情感悖论的可能路径。

5. 结语

本研究以南京 F 社区为窗口，采用混合方法设计，系统考察了技术治理对老年人安全感的影响机制，揭示了三个核心发现。第一，技术治理与安全感呈现“整体正相关、局部 U 型分异”的非线性关系：技术治理感知对安全感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但分组比较表明中等使用组安全感显著低于两端，整体效率提升与局部情感损耗可能并存。第二，U 型分异源于三重张力的叠加：两条提升路径主要惠及高使用群体，三条削弱路径分别作用于低使用与中等使用群体，三重张力在中等使用群体中汇聚，使其陷入“信任真空”与“形式化焦虑”。第三，“技术-人情双轨制”是缓解悖论的可能路径——人情节点须同时拥有信任资本与制度通道，并被纳入技术系统反馈闭环。

本研究存在若干局限：量化样本有限，横截面设计难以推断因果关系，城乡结合部案例的特殊性亦限制结论推广。未来可开展跨区域比较以检验其外部效度。本文揭示的情感悖论并非养老服务独有，智慧医疗等领域同样面临类似风险。如何平衡技术理性与人文价值，是数字时代社会治理的共同命题。本研究旨在为此提供一个具体的分析案例与理论注脚。

参考文献

- [1] 苗国, 辛晔. 构建有温度的中国式数智养老新图景[N/OL].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6-04-03.
https://www.cssn.cn/shx/cxfz/202604/t20260403_5979326.shtml, 2026-05-06.
- [2] 盛亦男. 数智技术对老年家庭的重构、风险与建设方案[J]. 社会建设, 2025, 12(3): 54-75.
- [3] 张钊. 技术-制度互构: AI 赋能养老服务的现实图景、结构性冲突与协同路径[J]. 人口与社会, 2025, 41(6): 104-115.
- [4] 田舒柳. 优化基层科技适老的“长辈模式”[N/OL]. 湖北日报, 2026-01-28.
https://epaper.hubeidaily.net/pc/content/202601/28/content_339072.html, 2026-04-13.
- [5] 刘婵君, 李爽, 郭锦言. 国内外智慧养老研究比较分析: 议题选择、理论分野与方法取向[J]. 电子政务, 2023(9): 90-104.
- [6] 戴年红, 符思. 智慧养老护理中情感关怀问题剖析及应对策略[J]. 中华志愿者, 2025(2): 45-47.
- [7] 周怡. 信任模式的社会建构[EB/OL]. 人民网理论频道, 2013-08-31.
<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n/2013/0831/c40531-22761057.html>, 2026-04-13.
- [8] 毛明芳. 现代技术风险的制度审视——乌尔里希·贝克的技术风险思想研究[J].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2012, 29(2): 61-65.
- [9] 鲍磊. 极端现代主义的运作逻辑 读《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J]. 博览群书, 2005(5): 90-95.
- [10] 刘永谋. 福柯论技术治理[J].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40(3): 9-22.
- [11] 郝亚光, 欧阳倩. 过程——结构视角下政策冲突的形成与应对——基于广东省 L 县的考察[J]. 求实, 2022(6): 37-46+108.